



· 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十四） ·

全球与本土之间的 标识性概念建构

在全球化时代，如何建构自主知识体系，是近年来中国学术界的研究焦点之一。其中，立足中国本土的实践与问题，提炼出既能深刻反映自身情境、又能与国际社会进行有效对话的“标识性概念”，便成为打破知识依附、实现理论创新的关键突破口。这一努力绝非走向封闭的本土主义，而是在“全球”与“本土”的辩证张力中，寻求一种既根植于中国大地、又面向人类共同知识宝库的理论创造。它旨在将中国的经验转化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资源，从而不仅为理解中国提供钥匙，也为丰富全人类的社会科学知识作出贡献。为此，本刊特邀六位学者，从多个视角出发，共同探讨标识性概念的生成逻辑、建构路径及其在知识体系中的定位，旨在推动中国学术从“概念输入”走向“概念创造”，实现从知识移植到知识自主的转型。

郭忠华教授追溯了标识性概念的起源与内涵，指出其作为建构自主知识体系起点的关键作用。没有标识性概念，也就没有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出发点。王宁教授认为从本土概念入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可以避免“独特性湮没”现象，但需要防止陷入“独特性孤岛”问题，他强调标识性概念必须放在存量概念地图中来定位。孙江教授提出“全球本土化”作为概念史研究方法，主张在跨文化视野中实现概念的在地转化与理论超越，并指出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不能执着于过去，问题意识应该朝向未来。唐亮教授分析了全球化背景下概念创新的路径，呼吁强化基于共性研究的理论建构与国际对话，并尊重和保护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自主性。周平教授以“边疆治理”概念为例，阐释了本土性概念在回应现实问题与推动知识原创中的重要意义，即提供认识工具、促进知识生产、服务国家决策和传承中华文明。叶娟丽教授基于经验的维度，总结出概念建构的四项理想标准：具有突破性的理论解释力；具有可操作的研究适用性；具有持续的影响力；具有广泛的跨界接受度。

——主持人 杜运泉

标识性概念：起源、含义和方位

郭忠华，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

标识性概念的历史追溯

标识性概念作为一个概念被正式提出是相当晚近的事情。尽管此前可能存在类似的提法，但真正有意识地形成这一概念则是在2016年。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发表讲话，提出“要善于提炼标识性概念，打造易于为国际社会所理解和接受的新概念、新范畴、新表述，引导国际学术界展开研究和讨论”。^①这是“标识性概念”首次被有意识地提出并被赋予历史使命。此后，随着“自主知识体系”“两个结合”等表述相继被提出，标识性概念的重要性进一步得到彰显，它们使不少学者认识到，标识性概念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出发点和基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则是标识性概念建构的源头活水。“中国知网”（CNKI）的数据显示，首次出现以“标识性概念”为篇名的学术论文是在2017年，考虑到学术研究的相对滞后性，这一时间与上述“5·17”讲话的时间基本吻合。该数据库显示，有关标识性概念研究的升级主要是在2023年之后。时至今日，以标识性概念为主题的研究成果、学术研讨会等已呈井喷之势。

“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实际上与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的发展史紧密关联。中国现代学术的兴起主要是在鸦片战争后，政治学、社会学、法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的兴起都出现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于当时西方现代学术的强势影响，这些学科基本上以引进西方基本概念、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作为开端，具有明显的外源性特征。具体而言，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科学的学术史上主要出现过三次大型引进浪潮：一是从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西化思潮，主要是在与西方的一系列痛苦接触中认识到西方的先进和强大，从而产生“以西为师”的认识；二是新中国成立后的向苏联学习浪潮，主要是在“冷战”世界格局和苏联的

影响下出现的学习行为；三是改革开放后的“补课”潮流，主要是重新向西方开放后出现的急于赶上世界发展步伐的追求。每一次引进浪潮都深刻影响了中国的学术研究，且与中国现代国家的发展方向息息相关。



外来知识的引入尽管使中国在较短时间内建立起相对完备的学科和学术体系，但由此产生的问题也同样明显，集中体现在外来知识体系对本土学术思维的支配上。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不同于自然科学的知识。后者很大程度上具有跨情境和跨文化的适应性，比如只要在地球范围内，牛顿三大定律就不会因为文化和情境的差异而出现不同的效果。但社会科学知识却具有明显的情境性和价值性特征，在特定文化和情境下获得的知识在另一种文化和情境下很可能变得不再有效。社会科学知识的效度依赖于对知识的抽象程度：抽象程度越高，适用的范围越大，但反映的情境性和价值性因素则越少；抽象程度越低，适用的范围越小，反映的情境性和价值性因素便越多。^②反映到中国，当移植性概念成为中国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基础，基于中国情境的概念建构便会受到阻碍，学术研究的思维和表述便变得依赖于外来的概念和理论，导致在学术研究过程中出现生搬





硬套、削足适履等问题。

自中国社会科学建立伊始,有关知识本土化和自主性的反思就连绵不绝,而且呈不断增强的趋势,概念的本土化则是其中的连贯线索。从20世纪90年代末到21世纪初,有关“本土化”的反思已成为一种明显的学术思潮。2011年,邓正来出版《中国法学往何处去》,明确提出以“主体性的中国”去参与世界学术对话、去修改世界学术规则的构想。此后,社会学接过讨论的接力棒,形成一场规模宏大的有关学术本土化与普遍性的争论。参与者围绕研究议题、学术概念、基本理论、研究目的、研究方法等主题展开争论,出现观点对立的两个阵营:一方从中国情境、中国价值的角度出发,主张议题选择、研究目的、概念使用、研究方法等方面应当摆脱西方学术的影响,实现学术研究的本土化和自主性;另一方则从知识普遍性的角度出发,认为本土化是一个伪问题,学术研究应当以追求普遍性知识为目标,而不能仅满足于本土化应用。^③随着2016年以来有关建构本土标识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等要求的提出,这一学术争论随即落下帷幕,本土标识性概念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成为学术研究的主流。此后,有关标识性概念建构的讨论迅速延伸至各学科领域,学界开始讨论各学科标识性概念体系的构成方式和建构方法。此外,有关标识性概念建构的原理性讨论也时有出现。

标识性概念的基本含义

尽管标识性概念只是晚近才有意识地建构的一个概念,但它具有深厚的现实和理论基础,值得加以深入剖析。

首先,在经验和现实层次上,标识性概念具有明显的针对性,它既是对中国概

念体系现状的反思,也是对建构本土化概念体系的期待。如前所述,由于长期知识移植等原因,中国社会科学的概念体系主要建立在移植性概念的基础上,本土建构的概念不仅数量有限,而且建构的意识也不强。有学者就这一问题进行过探讨,认为这与中国学术传统中长期延续的“述而不作”的经验思维有关,即只是用经验思维来描述事实,而很少用清晰明确的概念进行表达。^④这种情况不仅导致本土特色性事物无法被概念化,而且还影响到学术研究的思维方式,许多学术研究只是对西方理论进行印证,本土实践却无法提炼成知识。“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就是要建构符合本土情境—价值的概念体系,增强本土概念供给。这既是对中国概念供给现状的批判性反思,也是对未来概念供给走向的一种要求。

其次,在学理层次上,标识性概念是社会科学知识特性在中国的体现。如前所述,社会科学知识不同于自然科学知识,社会科学知识具有“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特征。^⑤所谓多元化的普遍主义,即在特定情境—价值条件下所获得的知识只具有有限的效度,只能适用于特定的范围。但是,这种知识又不只是一种特殊性和情境性的知识,还隐含着普遍性要素。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对于同一种事物可能由于情境—价值的差异而形成“多元化”的解释。例如,同样是猪肉价格下跌,在一个国家可能是由于猪肉供应过量,另一个国家可能是由于肥胖人数过多,而在其他国家则可能是出现了其他替代性产品。同一种现象后面隐含着不同的原因,或不同的现象后面隐含着相同的原因,这就是社会科学多元化的解释机制。从这一角度而言,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要去寻求能够适用于整个人类的规律性解释,而是要在现有的解释之外发现其他新的差异性解释,把所有解释汇合在一起便构成有关特定种类事物的总体性解释。从多元化的普遍主义的角度衡量,社会科学知识是一种介于经验知识与自然科学知识之间的一种“中层知识”:通过概念化、理论化等方式,社会科学知识获得一定程度的抽象性,摆脱了经验知识的感性特征,但同时又没有达到自然科学知识的普遍化程度,而是与情境—价值因素紧密联系在一起。社会科学知识的这种特性反映在概念体系上,即要求每

一个文化体系都建立与自身情境—价值相一致的概念体系。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建立起符合本土实际的知识体系，才能在人类的知识之树上拥有相应的位置。标识性概念的提出和推广，正是社会科学知识特性在中国情境—价值条件下的体现，反映了中国社会科学研究正日益走向自觉。

何为标识性概念？时下，有关标识性概念的研究成果虽多，但大都把它作为自明的概念来加以使用而很少对它进行清晰的界定。从最简角度定义，标识性概念就是基于“本土特色”事物所建构起来的。这一定义具有三方面的含义：一是概念对象的“本土性”。标识性概念所指向的对象必须是“本土特色”事物而不是普遍性事物，主要体现为只出现于本土情境下的特色实践、特色经验和特色价值；二是概念建构方式的“原创性”，标识性概念由于只与本土特色事物相关联，因此具有鲜明的原创性，如果不经过本土化改造，移植性概念很少能成为标识性概念；三是概念建构目标的“主体性”，由于标识性概念是一种与本土情境—价值相一致的概念，以它为基础开展学术研究有助于提升研究的主体性和知识的自主性。

在建构方式上，“标识性概念”体现了社会科学概念的特定建构机制。通常而言，社会科学概念建构存在概念提炼（从经验到概念）、概念发明（从概念到经验）和复合单数（将具有复合含义的概念进行强制单数化）等方式。标识性概念不论在词汇选择还是含义赋予方面都体现出“复合单数”的特征。众所周知，概念的最基本功能就是“标识”。概念不是现实世界中的客观存在物，而是人们出于认识世界的目的而人为地建构的想象物，因此很少有哪个概念不具有“标识”的功能。德国哲学家石里克指出：“概念只是一种假想物，旨在为达到认识的目的使确切地标示对象成为可能。概念可能类似于分布于地球上使人们得以明确地标示地球表面的任何位置的经纬线。”^⑥这一论断的核心意思在于强调概念的标识功能。“标识性概念”在这一基本功能的基础上再加上“标识性”这一词汇，并把“标识性概念”的含义转化为对本土“特色事物”的标识，这一过程体现出概念建构者在词汇选择和含义赋予上所具有的语义权和主动性。根据这一含义，

标识性概念已不再表示标识普通事物的含义，而是转化为专门标识本土特色事物的含义。

标识性概念的构成与方位

概念表面上看似简单，但亦有复杂的构成方式。可以依据不同的标准来理解标识性概念的构成，包括内部与外部的角度、单一与关系的角度等。从内部角度衡量，主要探讨标识性概念的内部主要由哪些因素组成。在这一方面，标识性概念与其他一般性概念并不存在本质的区分。时下关于概念内部构成的研究主要存在以下两种代表性观点：一是认为概念由“内涵”和“外延”两部分组成，而且认为两者呈反比例关系；二是在这一基础上把思考范围扩大，认为任何一个概念都必须由对象、意义和词汇这三个要素组成，即所谓“奥格登—理查兹三角”。^⑦在要素之间的彼此关系上，对象代表概念所指向的事物，代表概念与经验世界之间的关联；含义代表对象在观念世界中被赋予的意义，代表概念与观念世界之间的关联；词汇则是连接对象与意义的纽带，它沟通经验世界与观念世界。此类观点由于其典型性而被称作“经典模式”。^⑧但概念“三要素说”实际上并不充分，因为它仅考虑单个概念的内部构成，而基本没有考虑概念之间的外部联系及其存在方式。实际上，任何概念都不是单独存在的，必须与其他概念结合在一起才能形成认识世界和生产知识的力量。正因为如此，笔者曾提出，“场域”也是概念的有机组成要素之一，场域代表了概念的存在环境和关联方式。概念构成由此从“三要素说”（对象、意义、词汇）变成“四要素说”（对象、意义、词汇和场域）。以此为基础，还进一步形成了标识性概念建构的四条基本原则：



与对象联系在一起的是“差异性原则”，旨在廓清概念之间的边界；与意义联系在一起的是“一致性原则”，旨在提炼概念的本质属性；与词汇联系在一起的是“准确性原则”，旨在为概念选择恰当词汇；与场域联系在一起的是“谓述性原则”，旨在建立概念之间的解释关系。在笔者看来，一个理想的标识性概念应当具备如下品质：概念边界清晰、反映本质属性、词汇选择恰当和解释关系明确。^⑨

“场域”因素使我们从对单个概念的分析转入到对概念之间关系的分析。从单个概念的角度而言，每一个标识性概念都应当拥有上述四种要素，但概念之间的解释关系很少是一一对应的，而是会变得非常复杂。可以把拥有上述四种品质的概念称作“本质性概念”，但从概念关系的角度衡量，概念并非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和必须保持“本质性”状态，而是会随着“场域”的变化而发生要素调整：或者对象不再确定，或者含义发生损益，或者隶属关系发生变化，或者解释关系变得模糊。在实际情形中，“本质性概念”与“非本质性概念”始终是一枚硬币的两面：从单一概念的角度衡量，概念具有本质性的特征；但从概念关系的角度衡量，概念却表现出非本质性的特征。以乔治·拉可夫（George Lakoff）所举的“母亲”概念为例，这一概念必须符合以下要求：女性、给孩子提供50%的基因、孩子的降生者、孩子的养育者、父亲的法定妻子。但在现实生活中，基于母亲概念却衍生出基因母亲、生母、养母和继母等一系列范畴。相对于母亲这一原型概念，后面这些概念只是部分继承了母亲概念的内涵，从而构成了相对于母亲概念的非本质性概念。^⑩母亲概念反映的是上位概念与下位概念之间的本质与非本质关系，但两者的关系也可发生倒转，即上位概念

是非本质性概念，下位概念则是本质性概念。以维特根斯坦的“游戏”概念为例，它包括棋类游戏、球类游戏、纸牌游戏甚至临时约定的游戏等众多范畴，除非人为地对游戏进行临时边界划定（如约定游戏规则），否则它很难有清晰的边界。^⑪但这并不否定其下位概念可以拥有清晰的边界，实际上，任何一种特定游戏都必须拥有特定的规则（边界）、表达特定的含义，因为如果规则不清，游戏也就无法进行。这些情况说明，把上述四个要素作为标识性概念的內部构成只是一种理想类型，在现实概念建构中很可能出现偏差，形成非本质性概念。但是，非本质性概念现象并不损害“四要素说”的解释力，因为它充当了标识性概念建构过程中必须遵守的基本原则。

关系角度的定位还体现在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概念、自主知识体系等的区分和关联上。标识性概念与原创性概念是非常容易混淆的一对概念，但两者实际上存在不同的侧重点。原创性概念的核心在于“新”，体现在针对新事物、形成新内涵、建立新解释关系等方面。原创性概念主要是基于对新事物的认知而建构“新概念”的现象，因此相对既有概念，原创性概念必须表达新的事物类型，必须形成新的内涵。我们可以用既有的词汇来表达新的事物，但它必须被赋予新的含义。如果对象和内涵均与既有的概念一致，即使以新的词汇进行表达，它依然只是没有实质意义的重复概念供给。正因为如此，有学者指出：“概念的‘原创性’体现为概念的新的‘规定性’；概念规定性的原创性则具体地体现在概念的三重新内涵：新的思想内涵、新的时代内涵、新的文明内涵。”^⑫相对而言，标识性概念所强调的则是“差别性”和“自主性”，指相对于其他情境—价值体系而言，本土特色事物所体现出的差别，以及通过概念建构所形成的表达自由。标识性概念都是原创性概念，但反过来却未必成立。比如，“人工智能”是一个原创性概念，它为理解人工智能技术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的巨大改变提供了概念工具，但它并不是一个标识性概念，因为它标识的只是人工智能技术与此前技术之间的差别，而不表示“本土”情境—价值的差异性。同样的情况还体现在“新材料”“新能源”等概念上。与之相对照，“党政体制”“中国式

现代化”等概念则是标识性概念，因为它所标识的对象为中国所特有。从这一角度而言，原创性概念主要体现“历时”的性质，表示当事物在时间流逝过程中发生质变时所进行的概念建构；标识性概念则主要体现“共时”的性质，表示一个文化体系中的事物相对于其他文化体系而言存在的差异性。

在学术界，标识性概念还被称作“本土标识性概念”。应当如何看待两者的关系？前面已经指出，标识性概念已经表达了标识本土特有事物的含义，如果再加上“本土”这一限定词，势必造成含义上的重叠。实际上，本土标识性概念已经对作为其上位概念的“标识性概念”进行了含义转换，即把后者看作是标识“所有”本土特有事物的概念。众所周知，世界上存在众多不同的文化体系，每一种文化体系也都具有相应的标识性概念。例如，西方国家具有其标识性概念，阿拉伯国家具有其标识性概念等。面对这种情况，本土标识性概念强调的是反映中国文化价值的标识性概念，其中的“本土”专指“中国”。本土标识性概念是基于标识性概念所作的概念拉伸，它使后者变成了表达一般含义的上位概念，而用自身取代后者原有的含义。在当前中国情境下，标识性概念和本土标识性概念已成为可以互换使用的两个概念，但如果严格考察，两者所指涉的范围存在明显的差异。

最后，有必要澄清标识性概念与自主知识体系的关系问题。在时下中国学术界，两者通常是连带出场的一对概念，但它们显然存在明显的区别。标识性概念主要就概念而言，自主知识体系则是一个内涵更加丰富的概念：概念是对事物本质属性的概括，但知识则是对事物内在规律的揭示，概念只是通往知识的桥梁。两者之间的联系也非常紧密。以标识性概念为基础，研究者可以建立起基础命题，通过基础命题，研究者可以建立起体系化的理论。概念—命题—理论代表了社会科学知识形成的三个关键环节。何谓自主知识体系？目前学术界主要把它区分为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等三个组成部分。从三者的关系而言，学科体系表明了知识的构成和传承方式；学术体系表明了知识的生产和更新方式；话语体系则表明了知识的应用和交流方式。学科体系为学术体系提供专业平

台和知识基础；学术体系反哺学科体系，推动后者不断更新升级，同时也为话语体系提供基础和质料；话语体系则对学术体系提出要求和赋予价值。不论对哪一个体系而言，标识性概念都是其中的基础。没有标识性概念，也就不会有自主知识体系，标识性概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出发点。

注释：

-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16年5月19日。
- ② 郭忠华：《中国社会科学概念建构的基本策略——基于情境—价值的视角》，《江海学刊》2023年第5期。
- ③ 谢宇：《走出中国社会科学本土化讨论的误区》，《社会学研究》2018年第2期。
- ④ 徐勇：《学术创新的基点：概念的解构与建构》，《文史哲》2019年第1期。
- ⑤ 伊曼纽尔·华勒斯坦：《开放社会科学：重建社会科学报告书》，刘锋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第64页。
- ⑥ 石里克：《普通认识论》，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0年，第45页。
- ⑦ Charles K. Ogden and Ivor A. Richards, *The Meaning of Meaning: A Study of the Influence of Language upon Thought and of the Science of Symbolism*,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 World, 1946, p.11.
- ⑧ David Collier and James E. Mahon, Jr., “Conceptual ‘Stretching’ Revisited: Adapting Categories in Comparative Analysis,”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87, no. 4, 1993, pp.845-855.
- ⑨ 有关标识性概念构成要素和建构原则的更详细论述，可参阅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 ⑩ George Lakoff, *Woman, Fire, and Dangerous Things: What Categories Revel about the Mind*,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0, pp. 91-92.
- ⑪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李步楼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48—50页。
- ⑫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在当下中国，建构标识性概念是源于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需要，而标识性概念是知识的主体性和自主性的体现。^①在此意义上，标识性概念不同于移植性概念，它是反映本土情境和价值的自主性概念。^②因此，在



很大程度上，标识性概念被当作本土概念。学者们也基本上是从本土概念着手建构标识性概念的。例如，在国内社会学界，有的学者对日常生活中流行的本土概念或常人概念进行学理化改造，提出了“面子与人情”“关系”“自己人”等本土概念；也有学者基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中被广泛使用的政治或政策术语来建构本土概念，如“带头人”“集体”；还有学者则建构既能反映中国本土实际又能被国际读者所认可的突出中国特色的概念，如“逆向软预算约束”“关系产权”“关系社会资本”。

从本土概念入手建构自主知识体系中的标识性概念可以避免独特性湮没现象，但需要防止陷入独特性孤岛的陷阱。独特性湮没是民族共同体的知识体系缺乏自主性，因而其知识体系未能反映自身独特性的现象。而独特性孤岛则走向另外一端：民族共同体的知识体系虽然反映了自身独特性，但却未能界定本土

标识性概念如何处理独特性

——概念化中的独特性湮没与独特性孤岛问题

王宁，东南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概念在世界概念体系中的位置，使得本土概念变成一个概念孤岛。独特性湮没和独特性孤岛都是建构标识性概念过程中需要处理的重要问题。

独特性湮没往往出现在知识移植阶段。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之后，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采取了“走向世界”的姿态，大量移植西方人文、社会科学知识。这对于弥补当时国内知识创新能力不足发挥了重要作用。向西方学习的过程同时也是一个自主知识生产能力逐步获得的过程，但在初始阶段难免出现“食洋不化”“生搬硬套”“裁剪现实”（即通过裁掉中国现实中与西方概念不一致的东西，来使中国现实与西方概念达成一致）的现象。这种做法的后果之一，就是独特性湮没。它导致中国的民族特色或民族特殊性未能在概念体系中得到应有的反映。

独特性湮没有两种表现形式。第一种表现形式是选择性忽略。在应用西方概念来研究中国现实的过程中，当发现二者不一致时，不是据此对西方概念的适用边界提出挑战，提出新的概念，而是通过把中国现实中与西方概念不一致的独特性裁剪掉，来使剩余的现实符合西方的概念。在这里，与西方概念相一致的中国现实的一部分被保留，而不一致的部分则被有意或无意地舍去。第二种表现形式是选择性关注。学者往往从西方概念、命题或理论出发来寻找研究选题。与西方概念相对应的现象得到关注，而没有西方概念与之对应的本土现实却被忽略。

在很大程度上，独特性湮没现象源于改革开放早期国内某些学者的方法论训练以及相应的研究能力的不足。从知识创新方法论的角度看，发现中国现实与西方概念不一致，恰恰是进行知识创新的机会，但由于方法训练以及理论素养不足，这种知识创新机会被浪费了。独特性湮没现象还源于知识移植过程中所衍生出来的教条主义心态，即把西方概念当教条，缺乏对西方概念和理论“有一个适用边界问题”的意识，缺乏怀疑精神和批评能力，从而无法

依据中国现实不同于其他国家的独特性，形成创新性概念、命题或理论。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国内学界发出了社会科学本土化或中国化的呼声。经过几十年从西方移植人文、社会科学知识，尤其是通过中国学者结合中国现实所进行的研究实践，中国学者的知识自主创新能力得到很大提升。相应地，中国的人文、社会科学领域有着从知识移植为主的研究模式（用西方理论解释中国现实、中国现实是西方理论的例示）向自主创新为主的研究模式（创立自主知识体系和本土标识性概念）转向的迹象。在这种研究模式转向过程中，本土标识性概念成为学界的一个研究热点。它所侧重的，恰恰是中国现实中的独特性，即与西方社会现实不同的独特特征。而标识性概念就是捕捉这些独特性的概念工具。伴随着人文、社会科学的本土化和中国化实践，许多本土标识性概念被提出，如“政治锦标赛”“逆向软预算约束”“压力型体制”“悬浮型政权”“分利秩序”“韧性小农”“半熟人社会”“无主体熟人社会”“两栖消费”“两栖认同”“儒家二元消费伦理”等。

这些本土标识性概念的提出的确具有重要意义。它标志着中国学术共同体的自主创新能力的大幅提升。但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其中所出现的独特性孤岛现象。徐勇把国内学者基于经验研究提出的尚未体系化，呈现为个别的、零碎的、孤立的、互不关联状态的本土概念，称为“概念孤儿”。^③概念孤儿固然对中国现实独特性有解释力，但概念之间缺乏呼应，尚未形成逻辑联系，没有形成体系化概念。但本土概念的体系化不仅是一国范围内的本土概念之间的体系化，而且是本土概念与国际通用概念发生逻辑关联的体系化。如果说，没有体系化的本土概念可以称为“概念孤儿”（徐勇认为把本土概念体系化就是让概念孤儿回家），那么，没有与国际通用概念发生逻辑关联的本土概念，则可以称为“概念孤岛”。由于概念孤岛捕捉到了中国现实中的独特性，因此，它所对应的就是“独特性孤岛”。

独特性孤岛有三种不同的表现形式。

第一，“断亲式”独特性。它指的是独特性幻觉，把本来不是独特的现象说成是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学

者以为某个本土概念反映了中国独特性，但却不知道这种现象并非中国独有，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现象。其他国家的类似现象与中国的某种“独特”现象之间具有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可以表述为维特根斯坦所说的“家族相似性”。虽然各自有区别，但它们具有类的共同性。因此，这种本土概念其实应该是一种类型普遍性概念，反映了中国和其他某些国家所共有的一种现象。但中国学者在论证本土概念的时候，却误以为它为中国所独有，在引证经验事实时，仅提供中国的孤例，未能把其他国家的同类案例包括进来。这就如同与其他具有家族相似性的概念兄弟姐妹“断亲”。造成这种断亲式的独特性的根源在于缺乏国际概念储备以及国际比较视野，把关于中国社会的研究所得到的知识当作特殊知识，而不愿上升为类型普遍性的知识。

第二，“一阶式”独特性。它指的是用一阶本土概念替代二阶本土概念。本土概念可以区分为一阶（first-order）概念和二阶（second-order）概念。独特性孤岛体现在只停滞在一阶本土概念，而不愿上升到二阶本土概念。每一个国家的制度、文化和居民的日常实践都有其独特之处。相应地，每一个国家也都有其独特的用语和概念。虽然这些用语和概念在原则上可以翻译成其他语言，但翻译过程不可避免地会造成某些微妙含义的丢失。因此，在某些情况下，当进行翻译时，某国的某些本土术语或概念被原封不动地保留，以避免其微妙的含义丢失。例如，当中国的本土概念“关系”“人情”“面子”被翻译成英文时，就直接分别用汉语拼音 *guanxi*、*renqing* 和 *mianzi* 来表示。在这里，“关系”“人情”和“面子”就是一阶本土概念。

所谓一阶本土概念，就是常人或“普通人”在本土日常生活中使用的概念。它



流传久远、使用普遍，并对社会现实具有建构作用。一方面，它为人们提供了共享意义，让社会交流和互动变得可能；另一方面，人们依据这些概念来采取相应的行动，从而建构了符合这些概念所指称的现实。例如，当人们使用“面子”概念时，虽然不能清晰地用语言来为其下定义，但能依据具体的情境确定其含义，并避免做出丢面子的事。在此意义上，这些本土概念就是一种展演性 (performative) 或建构性概念，人们不但习得如何使用这些概念的方法，而且也用它指导实践、建构社会现实。在此意义上，一阶本土概念具有社会建构性，因而属于社会本体的组成部分。换言之，本土概念不但是帮助常人理解社会关系的认识论意义上的概念，而且是具有建构社会现实的本体论意义上的概念。例如，人们依据对“关系”的理解，用“关系”概念指导行动，就在客观上建构了一种符合“关系”这一本土概念意涵的社会关系。在此意义上，“关系”就是一个展演性概念 (通过行动或展演把概念的意涵转化为客观现实)。

作为自主知识体系的标识性概念可以是上述这种一阶的本土概念吗？我以为，这些本土概念要成为标识性概念，有待从一阶上升到二阶。理由很简单。这种本土概念之所以流行开来，不是基于建立知识体系的理由，而是基于社会交往和社会生活实践的理由，而其含义与具体情境高度相关。这种高情境依赖的一阶本土概念很难为其他国家的读者所充分理解。而标识性概念必须具有跨国可交流性，让处于其他情境的读者也可以理解。可见，要让一阶的本土概念变成标识性概念，需要摆脱其所具有的独特性孤岛现象，用国际通用的概念来对其独特性进行阐述，从而从一阶本土概念上升为二阶本土概念。所谓二

阶本土概念，就是学者用国际通用概念对一阶本土概念的独特含义进行“拆解”“阐述”和“再组装”，从而使其进入国际通用概念体系。只有这种二阶本土概念才可以充当本土标识性概念，因为它不但是进入国际通用概念库存体系的概念，而且成为国际读者可以理解的、进入国际流通体系的概念，从而不再是一个孤岛概念。换言之，本土标识性概念不能是“自拉自唱”式的，而必须是国际通用概念的库存和流通体系的组成部分。

第三，“脱联式”独特性。概念往往只有与其他概念结合成一个概念体系 (或理论体系) 才具有确定的意义，否则人们就无法从概念的多义或歧义中确立其中一种意义。例如，英文 agency 既意味着“代理”，又意指“能动性”。要确立其特定的意义，就必须依据语境 (如与 structure 相对)。从人类知识的角度看，中国研究所获得的知识，也构成人类知识的一部分。把中国的本土标识性概念放在世界知识体系的语境下来定位，以确定其世界概念体系中的坐标位置，有助于中国知识体系走出去，融入世界知识体系。“脱联式”独特性就是只提出了本土标识性概念，但未能把它们与国际通用概念体系关联起来。这种脱离了世界概念坐标的本土概念，就是一种孤岛式概念。而其所反映的现实独特性，也就成为独特性孤岛。

如何把本土概念与国际通用的概念关联起来呢？至少有三种关联法。其一，向上关联。本土概念与其他抽象程度相同的国际通用概念之上是否存在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 (即抽象度更高的概念)？本土概念的内涵可能是这个上位概念之下的一个独特的维度或方面。这个上位概念的其他维度已经清楚，且体现为国际通用的几个相关概念，而中国的本土概念则为其增加了一个额外的维度。例如，中国的“关系”是一个本土概念，它可以与国际通用的上位概念“社会资本”关联起来，中国的“关系”是国际通用的“社会资本”概念的一种独特维度，因此可以称为“关系社会资本”。^④通过与国际通用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向上关联，本土概念就可以上升为国际通用概念，即国际读者可以理解甚至使用的概念。以这种方式，本土概念就不再是孤岛化概念。其二，平行关联。是否存在与本土

概念相平行的、抽象程度相同的国际通用概念？它们是否属于一个共同的上位概念之下的N个平行维度(dimensions)或方面，或同属于一个变量概念下的N个变量值概念？例如，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就把“差序格局”与他所说的西方的“团体格局”关联起来。二者都是上位概念“权利—义务模式”下的两个不同的却在抽象程度上平行的维度，其中差序格局是一种依据关系距离来决定权力—义务强度的格局，而团体格局则强调个体之间的平等和对等交换，依据契约和普遍主义来决定权力—义务。再比如，费孝通所说的“礼治社会”是与西方的“法治社会”平行的概念，二者都位于上位概念“秩序类型”之下。平行关联的另外一种方式是本土概念看作一个独特类型，即揭示不同于国际通用概念所指称的一个或N个类型之外的一个新的独特类型。例如，笔者提出“儒家二元消费伦理”与西方的“新教一元消费伦理”相对应。把入世的儒家消费伦理与出世的新教消费伦理放在一起比较，可以看出儒家消费伦理是一个独特的类。徐勇提出的“祖赋人权”则构成与西方的“天赋人权”相反的一个类型。通过与国际通用概念“天赋人权”相关联，“祖赋人权”就摆脱了概念孤岛化状态，而不至于显得突兀。其三，向下关联，即提出一个本土的但却是普遍的概念，可以把现有的国际通用概念置于它之下（目前暂时还没有看到这样的概念）。

标识性概念必须放在存量概念地图中来定位。我们可以设想，在人类没有提出概念之前，现实就是一张白纸。随着人类发明了各种概念，概念体系就与现实世界对应起来，现实就逐步从白纸变成了概念地图。人类历史的发展，就是不断给人类现实添加越来越多的概念的过程。我们之所以提出一个新概念，是因为现实的某个部分还没有对应的概念（即概念地图上某个部分现实呈现为概念空白处）。我们给它添加一个概念，就让概念地图消除了一个空白处。

要给现实的某个部分添加概念，就要先了解现有的概念地图上是否已经有关于这一部分的现实的概念。如果有，那么添加概念就是多余的。而判定现实的概念空白处所依据的是全人类的概念地图，而不仅仅是一个民族的内部概念地图。因此，一个概念能否

成为标识性概念，必须依据国际的通用概念地图来判定。如果现有的国际概念地图中已经有了某个可以解释中国某部分现实的概念，那么，我们就没有必要再提一个相同的概念。我们只要沿用这个概念就可以。但问题在于，国外的概念存在于外语文献中，我们可能并不熟悉国外文献。当我们提出一个本土概念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国外是否存在类似的概念。在过去，我们可能因为缺乏足够的国际文献数据库而不得不独自建构本土概念。但在今天，高校和科研机构基本上都有国际文献数据库。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在建构本土标识性概念时，就必须先了解国际上是否已经存在类似的概念。也只有经过对比国际概念地图，本土标识性概念的地位才能得到真正确立。

所以，建构本土标识性概念与人类文明互鉴是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互联系的方面。概念是文明的一部分。文明互鉴就包括不同文明中的学者相互借用各自创造的概念。只有在这样的概念互鉴过程中，我们才能在建构本土标识性概念的过程中，既避免独特性湮没，又避免独特性孤岛，从而让本土标识性概念不但助力制度和文化自信的提升，而且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承认。

注释：

- ① 孙正聿：《原创性概念和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概念基础》，《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7期。
- ② 郭忠华：《自主知识体系视域下的标识性概念建构》，《中国社会科学》2024年第5期。
- ③ 徐勇：《将概念带入学术体系：为“概念孤儿”寻家》，《中国社会科学评价》2022年第4期。
- ④ 边燕杰：《论社会学本土知识的国际概念化》，《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5期。

近二十年来，概念史在中国学界渐为热点，这与众多学者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其中就有早在2009年成立的南京大学概念史研究团队。2014年学衡研究院（学衡跨学科研究中心）成立之时，我们将宗旨确定为：“梳理知识之谱系，前瞻学



术之大势，预流国际前沿，树立本土风范，谓其主旨曰全球本土化。”这里的“全球本土化”体现了概念史研究团队的学术诉求。作为主其事者，自然也渗入了我的思考。

1992年，我到日本东京大学留学，作为浸淫欧风美雨的“八十年代”的读书人，在中西之外扑面而来的是另一种冲击：日本。1993年春，我与黄宗智教授的博士生、现任教于明尼苏达大学的艾仁民（Christopher Isett）在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相识，当时他正在阅读刚刚出版的迈克尔·曼（Michael Mann）的《社会权力的来源》第一卷，我很好奇一个研究清代东北农村经济史的学者何以要读欧洲史著作，他说美国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读欧洲史。一言点醒梦中人，我视为学习目标的美中国学背后有着欧洲学术的影子，如此说来，要了解日本的中国研究也离不开对日本学术的了解。是年5月初，艾仁民邀请我到其在东京的寓所做客，在那儿与沟口雄三教授相识，饭前饭后沟口主要与我交谈。沟

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

孙江，澳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教授

口是日本学界的“孤狼”，批判战后日本左翼史学实为西方中心论的翻版，提出了看似与柯文（Paul Cohen）遥相呼应的把中国作为方法来理解的视角。现在看来，沟口的方法论存在将中国历史外在于世界历史进程的危險，但其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对当时的我颇有吸引力，若论我何时萌发了“全球本土化”的想法，就在此时。

“全球本土化”释义

“全球本土化”又作“全球在地化”，译自glocalization，后者由globalization（全球化）和localization（本土化、在地化）构成，意为全球视野、本土实践。十年来，总有人问我何谓“全球本土化”？我一直避而不答，且不论问者能不能或愿不愿接受我给出的答案，对于既有的答案，我自己心中是存有疑惑的。

1991年版《牛津新语辞典》（*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New Words*）认为，glocal和glocalization在20世纪80年代成为商业用语，主要来源于日本在推销产品时采取的营销战略，与日语dochakuka（土着化）有关，后者最初是将耕作技术应用于当地条件的原则，后在商业中亦被采用。罗伯特森（Roland Robertson）在《时空与异同质性》一文中强调这源于日本历史上基于对特殊和普遍的关注而着力培育自身的时空文化。^①

对于《牛津新语辞典》和罗伯特森的解释，我是持怀疑态度的，理由是在日本文化里“土着”（dochaku）与“外来”（gairai）是对应甚至对立的关系，如国学与洋学，不能没有媒介地把当下的商业行为附会成历史上的文化惯习。全球本土化的根源应该从文化适应（cultural accommodation）来理解，历史上中国不同族群之间存在文化适应问题，全球化开始后西方传教士在宣教过程中采取过文化适应策略，但是，这些都不是全球本土化，因为自他界限分明，彼此存在张力关

系。全球本土化的关键在全球化——去中心化，然后才是本土化；反过来说，去中心化的本土化虽然有批判西方中心主义的取向，但绝对不是排他的。我很同意德国学者斯坦因梅茨（Willibald Steinmetz）的看法，他批评执着“土著术语”的玛格丽特·佩尔瑙（Margrit Pernau）是另一种西方中心主义——异国情调。^②一言以蔽之，全球本土化是在承认彼此以及彼此可以共存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在这个意义上，1922年1月创刊的《学衡》杂志可谓开启了全球本土化的先河。《学衡》主张“昌明国粹、融化新知”，超越了中西、古今二元对立，承认中西、古今之间存在互文性。基于这一认知，以全球本土化为旨归的概念史研究是对以往概念史的超越。

从本土到全球

概念史是德国学术传统的产物。确认这一点很重要，国内学界常将概念史与法国学界的话语分析、英国剑桥学人的政治思想史相提并论，实有必要作一定区隔。法国学界对概念史不屑一顾，受教于科塞雷克（Reinhart Koselleck）的弗朗索瓦·阿赫托戈（François Hartog）称概念史在法国是不敢说出自己名字的思想史。^③英国政治思想史学者斯金纳（Quentin Skinner）认为不存在概念史，只有围绕概念的争吵史。这里有学术理念的不同。

作为德国学术传统的概念史体现了文化保守主义倾向。概念史研究认为，概念介乎语言和事件之间，概念之所以成为“史”是因为积淀了特定的经验。科塞雷克在回顾二战对其影响时说道：有些经验，像炽热的熔岩倾入身体并凝固，从此它们可以随时被唤起，可以转化为如此真实记忆的经验并不多见。^④个体经验如此，由语言一概念承载的集体经验也是如此，而概念里的经验或记忆与实际之间无疑存在既关联又乖离的张力。特别是，在急剧变动的18—19世纪，构成新时代的基础性概念折射出该时代的经验。科塞雷克在《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Geschichtliche Grundbegriffe: historisches Lexikon zur politisch-sozialen Sprache in Deutschland）第一卷导

言中通过四个方面予以观察：“民主化”——由特定阶层垄断的概念漫及各个阶层；“时间化”——概念被赋予所期待的特征并在实践中发生变化；“可意识形态化”——概念的抽象化虽然使其无法对应事件和社会结构的变化，因多义而为不同阶级各取所需；“政治化”——使用者按照自身的意图对概念重加塑造和应用。这四点被视为“四化”，是人们议论德国概念史时的老生常谈。

科塞雷克所关注的概念形成于18—19世纪，概念史是用以书写历史的一种方式。与科塞雷克一起编纂大辞典的孔茨（Werner Conze）认为历史书写有三种方法：传记的、统计的和概念史的。传记是历史叙述的基本方法，为现代史学所承袭；统计指对历史进行社会科学研究；而概念史方法关注的“史”反映了撕裂的现代——内在与外在、良心与服从、社会与国家的分离。另一方面，孔茨注意到这种撕裂状态在20世纪发生了改变，他试图以“结构史”来将近代以来的历史统摄起来加以研究。然而，在下一个世代的概念史学者看来，《历史性基础概念：德国政治—社会语言历史辞典》的概念史无论是作为研究对象，还是作为研究方法，都略显陈旧，因为20世纪历史性基础概念已经发生了很大改变。戈伊伦（Christian Geulen）提出了新的“四化”标准：一曰“科学化”，指科学的理论和概念成为日常语言；二曰“通俗化”，指媒体的巨大影响；三曰“空间化”，指科技发展缩短了空间距离；四曰“液体化”，指多元化和流动化造成概念意义的不确定。在戈伊伦那里，基础性概念显露出不确定性。科塞雷克的后继者斯坦因梅茨干脆说，不能从绝对的立场创造或判断一个概念，20世纪的概念自身具有反思性，每个概念都需要反思自身。^⑤至此，跨出一国一族的概念史研究呼之欲出。

在欧陆，目下概念史研究的中心已经移转到北欧，相关团体每年举办学术研讨会，从跨国、跨文化的角度研究概念的全球史。^⑥概念史研究的另一个重要据点在东亚，日本发其端，韩国领其先，中国后来居上。我曾从中国角度描绘在全球知识转移中的概念形成问题，这里再略作铺陈。

明清之际，原本要用基督的光芒照亮中国的西方传教士在中国发现了别异于自身的“文明”，于是17世纪出现了公元前后的区分；耶稣会士关于中国文化的介绍对18世纪启蒙思想产生了影响，而启蒙学者的言说影响了20世纪中国人对自我形象的塑造。19世纪西方虽然对中国知识的需求锐减，但出于商业和文化目的，关于中国的知识仍在一定范围内流传，最终以“汉学”（Sinology）身份进入大学教育体制中。如果说，18世纪是耶稣会士在中国发现“文明”的时代——比较诺伯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文明的进程》不难知其意义，那么，19世纪则是中国人发现和承认西方“文明”的时代，以器物、制度和思想等为标识的“西学”多层面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进程。与此同时，19—20世纪之交名为“东学”的日本化西学知识对现代中国知识空间的形成也产生过重大影响。20世纪20年代是主义高扬的时代，苏俄革命化的知识开始影响中国知识青年。以抗日战争为契机，革命化知识与民族需求融合，最终成为均质化的概念。李恭忠从语言翻译、文本传播、制度变迁和政治社会实践等入手，把这四百年间形成的概念分为世界群、国家群、民族群、社会群、个人群等来把握，试图梳理其生成演变的基本脉络。^⑦从历时性看，我所谓的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可以一分为二：来自西方的概念是如何中国化进而构成中国的现代经验的，如何在中国革命中生成进而铸就未来中国的。

全球本土化概念

哲学家罗素（Bertrand Russell）在《逻辑实证主义》中说：“没有人能理解‘奶酪’一词，除非对奶酪的非语言层面有所了解。”语言学家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在《关于翻译的语言问题》中借此引申道，无论是作为语言学家，还是一般的文字使用者，任何语言符号的含义都是将其转化成另一种符号并予以进一步的解释。在雅各布森看来，被翻译成同一语言的其他符号，也可以翻译成另一种语言，以及另一种非语言的符号系统，于是翻译呈现出三个面向：一是语言内的翻译，通过同一语言的其他符号来解释言语符号；二是语言间的翻译，通过其他语言来解释言语符号；三是符号间的翻译，通过非语言符号系统来解释语言符号。^⑧雅各布森的理论在学界被广泛运用，第三点非语言符号的翻译，如图像、仪式、纪念碑等，科塞雷克也有深度涉及，近代中国在对西方事物移植的过程中也多有涉及，这里暂不讨论，仅就前两条看西来概念本土化之问题。

用汉字对译西语，无论是固有的，还是新造的，都涉及传统概念的转译（义）问题。传统概念犹如储存于图书馆的休眠的知识，只有转换为功能性知识方可与当下发生联系，因此，即使存在语言内的翻译，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概念绝大多数都经历了“传统的发明”（invention of tradition），即所谓传统并非原汁原味的。19世纪以降，大量西方概念直接或间接地被译介到中国，经由中国人的创造性再生产最终化为中国概念。

如果按照时间轴研究概念的话会陷入主题散漫、叙述缠绕的状态，在此我提倡的是“现在中心主义”的研究。我常引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的名言：“人体解剖对于猴体解剖是一把钥匙。反过来说，低等动物身上表露的高等动物的征兆，只有在高等动物本身已被认识之后才能理解。”以逆时间——问题导向的研究——为指针的话，20世纪中国革命中的概念生产问题便会浮现出来，于是，我们将面对从概念里发现革命的问题。

科塞雷克描述过革命概念在欧洲语境中的演变。

他认为，近现代革命至少涵盖两个经验空间，一个是暴力，另一个是从过去到未来的结构转变，超越了暴力这一狭隘范畴，最终革命概念成为涵盖无数领域的复合单数概念（kollektivsingular）。18世纪进步成为革命的指向，启蒙的历史哲学将宗教的救赎转述为保障人现世幸福和摆脱束缚而获得自由，这是革命概念转变的近代契机，人们可以从叛乱和内战中加以把握。今日的近代意义的革命缘起于法国大革命——首次和反“独裁”（diktatur）联系在一起。法国大革命以后，作为复合单数概念的革命具有一过性和反复性、历时性和共时性的特征。共时地看，“革命”含有“反革命”；历时地看，“革命”与“反革命”互相促进。20世纪的中国，种族、政治、社会、文化等革命依次展开，民族主义、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交互激荡，来自西方的翻译概念经过革命的荡涤，有的沉潜，有的转义。学衡研究院李里峰主持的“革命的概念史研究”正在推进该研究。

在我看来，以概念的当下意味来回溯其由来，既可回避概念史研究纠缠于词语史，亦可与脱离实际的观念史一刀两断，收录于“学衡尔雅文库”丛书的拙著《人种》加上未能收入其中的一篇文章反映了我在全球本土化概念史研究上的初步尝试。^①在这项研究中，我不是从词源学角度梳理人种概念的，而是以1936年中国出版的第一部《辞海》收录的“人种”词条内容来探究占主导地位的“人分五种说”的来源，这样很自然地追溯到18世纪欧洲的人种学，特别是首倡“人分五种”的德国学者布鲁门巴哈（Johann Friedrich Blumenbach）的假说。这种知识是经由大英帝国的网络传布到中国和本国的，我辨析了19世纪意识形态化的人种知识在日本的“再差异化”和在中国的“人种对抗”的分途；书中讨论了19—20世纪之交的“黄祸论”、黑人解放话语等问题。从《辞海》1962年和1979年改版的内容变化可知，强调等差的西方人种概念在中国革命中被最终解构。

在推进研究时，我特别强调关注语义场（Semantic field）的重要性。革命（组织）在强制的命令、规章或宣传下展开，概念由此成为革命（组织）的标记，而概念不仅仅指涉革命（组织），还创造了革命分分合合

的体制。中国革命中的概念同样有一过性与反复性、历时性与共时性的特征，且呈现出匀质化与混杂化的张力。革命在运动中展开，其所追求的“一”与实际的“多”存在张力：革命的经验有左有右，甚至可以反转，匀质化的强化反而限制了自身，因此，有关革命的概念史研究可在革命—反革命、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国民党—共产党、干部—群众、地主—农民、工人—资本家、国际主义—民族主义等二元对立关系中透视其特质。全球本土化的概念史研究不能执着于过去，问题意识应该朝向未来。如果我们关于过去的研究不能提供未来所需的经验，那么不如认认真真地做一个历史的守灵人或者旁观者，而不要在其上随意涂鸦。

注释：

① Roland Robertson, “Glocalization: Time-Space and Homogeneity-Heterogeneity,” in M. Featherstone, S. Lash and R. Roberston, eds., *Global Modernitie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5, pp. 25-44.

② Willibald Steinmetz, “La sémantique historique : problèmes théoriques et pratiques de recherche,” *Passés Futurs*, Numéro5, Juin 2019.

③ 参见阿赫托戈给上揭斯坦因梅茨法译文所加按语。

④ Reinhard Koselleck, “Vielerlei Abschied vom Krieg,” in *Geronnene Lava: Texte zu politischem Totenkult und Erinnerung*, Berlin: Suhrkamp Verlag, 2023, S.363-364.

⑤ 孙江：《概念史研究的中国转向》，《学术月刊》2018年第10期。

⑥ 孙江：《以概念为媒》，《探索与争鸣》2023年第3期。

⑦ 李恭忠：《概念史视野的中国近代知识转型》，《中国社会科学报》2024年8月21日。

⑧ Roman Jakobson, “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in Lawrence Venuti, ed.,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Reader*, London: Routledge, 2000, pp.114-115.

⑨ 孙江：《黑力攸关——非“中间地带”的革命与黑人的政治表象》，李里峰主编：《新史学》第17卷《表象中的历史：事件·记忆·书写》，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4年，第71—90页。

概念和理论体系通过对事物的本质和特征进行概括和总结，通过对事物和事物之间因果关系的分析和探讨，为人们更好地认识和理解纷繁复杂的世界提供了有力的工具。能否在概念和理论创新中有所成就以及成就多大，将直接关乎中国社



会科学的发展以及整个知识体系所能达到的高度。

既有概念和理论体系的局限性

概念和理论体系是建立在经验基础上的，是社会科学工作者在对社会现象进行深入的观察、分析和探究过程中形成和发展起来的。不过，特定社会科学研究者在进行研究时，总会自觉或不自觉地以及或多或少地受本土即特定的文化和社会经验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使概念的适用范围和理论体系的解释力受到各种程度的限制。在长达几百年的历史中，西方主要国家不仅是现代化进程的引领者，而且也是社会科学发展的主要推手。因此可以毫不为过地说，社会科学中旧有的或古典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主要是以西方文化和制度及其发展经验为基础建立起来的。

经过上百年持续不懈的努力，社会科学以各个学科为中心，建立和完善了能解释包罗万象的社会现象的概念和理论体系，为人

全球一本土化视域下 社会科学概念和理论的创新

唐亮，早稻田大学政治经济学部教授

类认识和理解社会发展的各种规律、有效地解决各种社会问题、不断促进社会进步提供了必要的工具。不过，基于西方经验的社会科学理论也不断遭到批判和质疑。在漫长历史进程中，不同地区、不同国家甚至不同地方形成了各种个性极为鲜明的文明，并对文化、制度、发展水平、社会结构以及发展模式等产生了各种重大的影响。在充满多样性的世界，以西方为主流的社会科学一是没有充分考虑到文化和价值体系的多样性，在政治和意识形态上构成了西方文化霸权的基础；二是未能充分吸收非西方世界在现代化进程中的经验，包括不同道路和发展模式的选择。

当然，包括西方学者在内的各国学者也一直通过国际学术调查和比较研究等方式努力吸收非西方经验，并已经取得一定的成果，形成了一些基于非西方世界的概念和理论。但欧美各国在很长一个时期内，受主客观条件的限制，对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研究主要是放在区域国别研究中进行的。社会科学寻求具有普遍意义的规则，区域与国别研究侧重于对非西方世界的特殊性研究，包括不同于西方世界的历史和文化，特殊的政治经济体制和社会结构等。社会科学有着严密的学科体系，在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下面还设有许多细分领域。社会科学研究者有着很好的学科训练，但其主要精力放在细分领域的研究中。在区域与国别研究中，学者们的背景既包括人文的也包括社会科学的。虽然他们有着各自的学术兴趣，但需要投入巨大的精力去跟踪和把握对象国的内政外交的整个动向，人文研究和社会科学的研究是交织在一起的。

全球化进程中的概念和理论创新

社会科学的发展需要雄厚的文化和物质基础，一个国家的学术研究水平总是与其现代化进程基本保持

同步，这是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研究始终处于领先地位的主要原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抓住全球化所带来的重大机遇，在现代化建设上取得重大成就。先是日本实现了经济复兴和高速增长，成为世界第二经济大国。到20世纪六七十年代，部分亚洲和拉美国家的工业化也取得很大的进展，被称为新兴工业化经济体（NIES），其中，亚洲“四小龙”最终在人均GDP上达到了高收入经济体水平。到20世纪80年代后，中国、印度等人口大国也先后走上高速发展的轨道，并与巴西、俄罗斯、南非一起成为引人注目的金砖国家。

许多新兴工业国家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一方面是吸收了发达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制度和发展理念，发展过程中充分利用和发挥后发优势；另一方面则是根据各自国情选择有效的发展模式和发展道路。因此，每当新兴工业国家迅速崛起时，各国社会科学研究者便会带着极大的研究兴趣和努力从宏观、中观或微观层面去分析和探讨其成功秘诀，提出一些基于新兴工业国家发展经验的概念和理论。如日本的成功为社会学贡献了丰田模式、终身雇佣、产业政策、开发型国家等概念和理论。

经济发展的巨大成就促进了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新兴工业国家在现代化建设的不同阶段有着不同的研究使命和研究能力。在相对落后的初期阶段，学术研究的主要使命是学习和吸收既有的社会科学成就，特别是西方国家的先进经验，同时基于本国国情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以探索有效的发展道路。随着现代化建设进一步向前推进，社会科学可以利用已有的知识和学术研究积累，在继续学习吸收先进研究成果的同时，结合本国发展经验进行概念和理论创新的初步尝试。当现代化进程和社会科学研究接近先进发展水平时，概念和理论的创新便成为最重要的使命，研究者也具备了更好的条件、更强的能力去实现这种使命。

全球化的进展也为基于比较研究的概念和理论创新提供了更好的条件。在很长一个时期内，非西方国家和地区不仅在文化、制度以及社会结构等方面与西方世界存在很大的不同，而且社会相对封闭，缺乏能与西方国家进行比较的相关资料和数据。但二战以后不断强

化的全球化浪潮以更快的速度、更大的范围促进了商品、资本、人员以及信息的跨国流动，促进了观念、制度在相互碰撞的过程中进行相互学习和吸收。随着信息化、数字化时代的来临，统计分析技术的发展以及跨国合作研究的扩大极大改善了国际比较研究的条件。在政治学研究中，区域与国别研究进入比较政治学的发展阶段。比较政治学依然与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很多重叠的地方，但前者比后者更多地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更加强调通过比较研究修正和完善以西方经验为主的既有政治学理论。

强化基于共性研究的理论创新

目前，中国社会科学迎来了最好的发展机遇，概念和理论创新成为其新的使命和发展动力。经过最近数十年的发展，中国社会科学不仅在人才和知识的积累上有了巨大进展，初步建立了能与国际标准对接的学术规范，而且在研究条件上也有了巨大改善。同时，中国现代化建设不仅是在一个人口众多、国土辽阔、起点很低以及城乡差异巨大的国度里展开的，而且其历史文化、政治经济体制、路径选择和政策手段等方面也与西方主要国家存在着很大的差异。因此，对颇具特色的中国经验进行理论分析和总结，可以更好地展示发展模式、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社会科学理论的完善和进一步发展作出贡献。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需要强化创新意识和创新方法，改善学术研究体制和学术研究氛围。

在进行概念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存在着特殊性和普遍性两种不同类型的研究。特殊性和普遍性存在于各国社会生活及其发展进程中。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的文明古国更是如此。有关特殊性的研究以及由此形成的理论既有着非常古老的历史之根，放眼当前



又与各国的人文研究和区域国别研究紧密关联。有关特殊性的研究主要通过各国知识精英基于本土特有的概念和术语来阐述其治国安邦之道，从各个不同层面描述和分析其制度体系和社会结构，记录和分析其重大事件和历史进程，提炼其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这种研究成果不仅关乎如何理解和认识国情、关乎国家和社会的治理效能，而且还可以为社会学的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养分，为实证研究提供必不可少的素材。但针对特殊性研究所形成的知识体系和理论主要是思想性、解释性和批评性的，只能适用于特定国情。

与特殊性研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有关共性的研究，其目的是探讨和发现能够超越特殊场域、特殊国情而形成具有普遍意义的法则，即具有普遍意义的理论。共性研究建构具有普遍意义的概念和理论，它有着区别于特殊性研究的研究规范。一是不仅需要概念加以明确的界定，使之能够说明和描述事物的本质和结构性特征，而且必须使概念具有可操作性，能够对变量进行测量。普遍理论是由自变量、因变量和中间变量等一整套概念组成的，研究者通过对变量之间关系的分析来说明因果机制，变量之间关系即相互作用的方式。二是概念和因果机制是根据研究目的和研究条件来设定的。只要符合设定的条件，概念和因果机制的分析便可以适用于所有的国家和地区。换句话说，在共性研究和普遍理论中，包括不同的制度、文化、发展水平等在内的各种特殊性或个性因素，是被当作条件来设置的，实证研究的目的是要考察这些不同的条件或不同条件的组合对过程和结果的不同作用。三是共性研究和普遍理论更多适用于实证性、归纳性以及统计研究的方法，大部分情况下将本国经验与外国经验进行比较。

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扎根于中国大地，不仅对其博大精深的文化有着内在的体验，已成为其精神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作为主人翁以各种方式参与社会生活，对社会进程及其背后逻辑有着广泛而深入的理解。因此，与国外的中国研究学者相比，中国社会科学研究者运用本土特有概念和思维模式来阐述中国经验方面存在着天然的优势。但在将中国经验提升为具有普遍意义的社会科学理论时，则需要中国的研究者们走出以本土特殊性为中心的学术舒适圈，在强化国际比较研究和与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对话方面作出巨大的努力，避免陷入特殊性的理论陷阱。

在文明发展特别是在现代化进程中，世界各国对发展、民主、自由、人权、法治和正义等人类共同价值有了越来越多的共识，并且在实现这些共同价值的过程中相互借鉴。对中外经验进行深入而细致的比较分析，有助于在共性中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中国特色及其背后的逻辑，将基于中国经验的概念和理论置于普遍发展规律之中。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学术研究越来越面向世界，在认识和理解国外经验特别是发达国家的经验方面，在学习和吸收既有社会科学理论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基于中国现代化实践的需要来认识和理解世界，反思和创新社会科学理论，则属于不同的层面，它不仅要求对国外经验和理论有更细致更深入的理解和把握，而且要求具有立足本土的理论创新能力。只有这样，基于中国国情的概念和理论才能在国际社会科学舞台上拥有立足之地。

理论创新的规范与学术研究体制

在社会科学各学科已经建立起一整套相对完整的概念和理论体系的背景下，实现概念和理论创新，还必须在立足中国经验、与既有理论体系进行批判性对话的基础上，提出具有独创性的概念和理论。为此，在各自的研究领域，研究者不仅需要明确而具体地说明既有理论在哪些方面适合或不适合对中国经验的分析，就不适合之处提出新的理论假说去修正和补充既有理论的不足，而且需要具体地说明用于验证新的理论假说的研究方法、事实依据和内在逻辑。换句话说，

通过批判性对话发现既有理论的缺陷，是实现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但目前国内的许多社会科学研究只是将既有的理论作为分析框架对中国经验进行了应用性分析，没有在进行批判和建设性对话的基础上提出独创性的理论。许多研究采用文献综述的形式，理论框架与实证对象之间却存在严重的脱节。其中最为典型的现象是，分析框架是顶层的概念和理论，研究对象却是微观和琐碎的案例。

除与既有理论进行批判性对话外，研究对象的选择、研究的切入点在概念和理论创新中也非常重要。研究对象不同于既有的研究，同时还拥有新的切入点或理论视角，概念和理论的创新就会有更大的空间。研究对象与已有的实证研究相近，概念和理论的创新则更依赖于新的切入点和理论视角。从国内社会科学研究现状来看，不仅研究课题因为高度集中在热点问题上而表现得重复和雷同，而且存在思维模式固化的问题，其结果是内容和观点的高度趋同，缺乏学术创新。有关现代化道路、现代化发展模式等研究大都采用宏大叙事方式，根据大致相同的事实和逻辑阐述着同一种理论立场。公共政策领域的许多微观研究表面上选择了不同的案例，但这只是在发生的地点和细节上有所不同，案例的背景和情节以及分析的视角则大同小异。许多研究偏重于选择成功的案例来强调成功的经验，但因为代表性不足而导致研究发现的适用范围受到很大的限制。

社会科学的理论创新还需要处理好基础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之间的关系。前者强调的是概念和理论创新，学术的色彩更浓。后者强调的则是将既有的理论应用于各个领域，带有更多的社会实践色彩。从理论来源于实践并接受实践的检验，同时又为实践提供思想和逻辑的指导这个角度来看，应用研究介于基础理论研究与具体社会实践研究之间。从社会分工的角度来看，大学等学术机构和学者的主要使命和特长是社会科学的基础研究，即理论创新；政府研究机构以及智库的研究人员承担应用研究；行政机构以及企业等是各个领域的社会实践者。学者出于争取科研经费以及通过参与社会实践获取资料 and 数据的考虑，直接承担了大量应用研究，特别是公共政策研究，这就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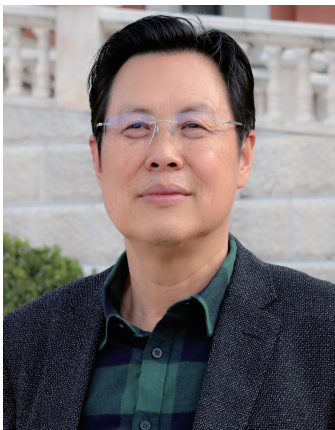
占了本可应用于基础理论研究的大量学术资源。

在大力推进概念和理论创新的过程中，还需要改变过度强调论文数量的学术评价体系。时间是每一位学者最为宝贵的学术资源。在研究能力等其他条件相同的情况下，研究课题越集中，学者就有更多的时间去检讨与之相关的既有研究成果，收集更多更完整的数据和资料，更充分地去思考理论创新的突破口以及分析的方法和路径。换句话说，资源的集中投入有助于提高研究的质量，促进概念和理论的创新。反之，同一时间内研究的课题越多，意味着学者必须将有限的时间分散在不同的研究主题上。无论是对既有成果的批判性检讨、资料 and 数据的收集和解读，还是论文的构思和论证的逻辑，会因投入的时间资源不足而显得粗糙，进而影响包括理论创新在内的论文质量。事实上，论文的高产更多的是既有知识和理论的再传播，很难称之为学术创新。

学术创造力来自学者的学术想象力以及坚持不懈的努力，概念和理论的创新需要最大限度地尊重和保护学者个人的学术兴趣和学术自主性。尽管学术界和政策制定者对此有着高度的共识，但在学术实践中却未能得到充分的落实。许多重大学术科研项目招标、学术期刊的选题以及各种纵向科研项目都属于命题作文，而且集中在与现实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上，与个人的学术兴趣和特长不尽一致。这导致许多学者出于争取科研经费、研究成果发表以及职称评定等个人利益进行考虑，而不是就其擅长的自主学术研究进行考虑。在命题作文上花费大量的精力，不仅会造成研究课题的重复和雷同，占用学者大量的时间资源，而且会妨碍学者的创造力和研究特长的充分发挥。

本土性概念建构是自主知识生产和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关键环节。

面对中国现实并能够解释中国问题的本土性概念的建构，本质上是一个实践性问题。当前学术研究和政策领域中广泛使用的“边疆治理”，就是在回应中国问题过程中建构



起来的本土性概念，并由于被广泛和频繁地使用而成为标识性概念。作为这一概念的创建者和推动者，我谨从这一概念的创建来谈谈本土性概念建构的意义。

在回应现实需要中创建新概念

秦统一中国并建立中央集权的统治，采取统一的国家行政体系来管理全国不同的行政区域，就遇到了如何对远离王朝中央并具有突出异质性的边远区域进行统治的问题。王朝采取了不同于核心区的体制和方式来进行统治，因而建立起一套针对疆域边缘区域进行统治的制度化安排，开启了中国边疆制度的构建。秦以降的各王朝承袭了这样的制度安排，从而巩固了把疆域边缘性区域界定为边疆的制度，以及关于边疆的叙事和认知方式。

由此界定的边疆关联着王朝的安全和稳定，王朝便在此设防、镇守、垦殖、贸易甚至与当地政权和亲，但边疆的发展与

从“边疆治理”看本土性概念建构的意义

周平，云南大学资深教授

王朝国家整体的关联并不突出，王朝政权并没有在国家治理框架中对边疆的治理作出制度化的安排。因此，历史上各王朝虽然重视边疆，却没有形成“边疆治理”概念。“我国对于边疆地区的开发和边疆问题的解决古已有之，但正式提出‘边疆治理’这一概念，并进行系统论述却是近年来学术界的热点问题。”^①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的政策并以此来推动现代化，正值全球化加速推进和不断深化之时，中国便在现代化过程中越来越深入地融入世界，国家行为逐渐遍及全球甚至拓展到了太空，国家权力覆盖的空间也前所未有的拓展。因此，中国的现代化在取得举世瞩目成就的同时，也导致了国家活动和发展的地理空间格局的根本性改变。这既是国家发展的必然结果，又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基础性条件。在此背景下，国家疆域边缘性区域的状态，尤其是该区域产生和存在的矛盾和冲突即边疆问题便愈加突出，进而对国家治理的整体格局构成了实质性影响，因此以国家权力来应对这些问题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就前所未有的突出，并成为国家治理与发展中的“痛点”问题。

我在边疆多民族地区调研多年，对陆地边疆尤其是边境村寨发展中面临的复杂问题有深切的感受，主持教育部重大攻关项目“边疆多民族地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研究”时，又对此进行了全面的思考，更加深切地认识到边疆面临的问题关乎国家的整体发展，必须把边疆的发展纳入国家发展的总体格局中加以谋划，并且以国家力量来应对边疆问题，既促进边疆发展，也为国家发展提供动力。但是，既有的边疆研究和理论中却没有一个能述说此问题的概念，因而对此“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②付之阙如。西方的边疆理论虽然丰富却没有以国家力量应对边疆问题的论述，中国历史上的“边治”、边政理论中没有相应的概念，当代的建设边疆、保卫边疆、稳定边疆、

兴边富民等概念也无法达此目的。面对这样的情况,“为了认识世界,我们就必须在某种意义上赋予它特定的含义,而这一任务是通过构建概念来完成的”。^③于是,为了回应现实的需要,我便创制了“边疆治理”概念。

“边疆治理”并不是在“边疆”概念上添加“治理”而形成的概念,而是经过一番系统的分析和论证才确立的原创概念。首先,必须从国家疆域的角度界定边疆。在国家治理框架中对边疆进行治理,就必须突破传统的将边疆视为远僻之地的文化边疆观,从国家整体角度来看待边疆。为此,我将边疆界定为国家疆域的边缘性区域,突出了边疆对国家整体的意义,确立了新型国家边疆观,为边疆治理确立了基本的前提。其次,要明确边疆治理的具体对象。边疆是一个政治地理空间概念,但由于其特殊属性所形成和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会对国家整体造成直接影响,这是需要用国家力量应对的对象。基于此,我提出了“边疆问题”概念而将边疆“问题化”,为边疆治理明确了客观对象。再次,确定了边疆治理的本质内涵。边疆问题是国家面临的问题,应对边疆问题是国家的责任,国家运用政权的力量并调动国家资源去应对边疆问题的过程和机制就是边疆治理。最后,界定了边疆治理的性质和地位。在把边疆确定为国家疆域边缘性区域,进而在边疆问题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中把握边疆治理内涵之后,我把边疆治理界定为国家治理的组成部分,从而确定了边疆治理的国家治理属性及其在国家治理中的地位。

经过一番全面的研究和多角度的论证而提出的“边疆治理”,成为一个具有丰富内涵和严谨逻辑结构的经验性概念。我在2008—2010年发表的多篇论文中提出并论证“边疆治理”之后,这一概念逐渐被越来越多的论者所采纳,并促成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形成,该概念也因此而获得了普遍性。

原创概念在与现实互动中升华

2010年中国经济总量超越日本而居于全球第二位,在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这不仅标志着中国的现代化取得了巨大的成就,也将国家活动和发展的地理空间格局根本性拓展的问题充分

地凸显了出来,使之成为国家进一步发展的谋划和布局必须重视的根本性问题。于是,国家疆域边缘性区域的突出问题及其应对,便成为国家治理与发展总体布局中的重大问题。在此背景下,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家决策层推出了一系列涉及“边疆治理”概念所指范畴的重大决策,并直接采纳了“边疆治理”概念:一是针对突出的海洋疆域问题,提出了“建设海洋强国”的战略;二是针对西藏、新疆等陆地边疆的突出问题,把“治边”置于“治国”的框架中论述,提出了“治国必治边”的命题;三是针对领土外国家利益积聚区越来越具有国家核心利益性质并受到严峻挑战的现实,提出了“海外利益攸关区”的概念,以及以国家力量去捍卫和维护这个特定区域的要求;四是提出了“加快边疆发展”的部署,把边疆发展提到国家战略的高度;五是提出了“陆海统筹”的要求,在国家治理的总体格局中把陆权与海权结合了起来;六是提出了“加强边疆治理”的要求,把“边疆治理”列入国家治理的总体格局;七是提出了“边疆治理体系”的命题,要求推进边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面对国家疆域状况改变后边缘地带迅速凸显的各种问题的挑战,国家决策层面面向现实,从治理与发展的总体安排出发,所推出的应对边疆问题的各种战略决策,既涉及陆地边疆又涉及海洋边疆,并把“陆权”与“海权”结合起来,从海陆兼备的大国的角度来布置国家的边疆治理;在“治国”的框架中强调“治边”,把作为边疆主体的陆地边疆的治理置于国家治理的框架中,凸显了陆地边疆治理的国家治理内涵;把领土意义的“海内”边疆与超越领土的“海外”边疆结合起来,从一个更加广大的政治地理空间中谋划和部署国家的边疆治理。这样的宏大格局已经突破了传统的疆域观



和边疆观,展现了从全球格局来看待国家的地理空间范围或疆域的宽广视野,不仅深刻影响了国家的治理,也扩展了对国家疆域进行观察和分析的眼界,为“边疆治理”概念的升华提供了巨大的动力。

我在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理论研究”过程中,对党的十八大以来的国家边疆治理战略进行持续关注和研究,受到这些重大决策所蕴含的广阔的地理空间观念的启发,并根据国家边疆治理战略的布局和实践,对“边疆治理”概念涉及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进一步审视和调整。一是改变了此前从国家疆域来界定边疆时,受到传统的陆权国家思维影响而形成的偏向于陆地边疆的倾向,把陆权思维与海权思维结合起来,进一步突出了海洋边疆的地位,并把海洋边疆与陆地边疆有机地结合起来。二是根据“海外利益攸关区”的概念及国家对海外利益的重视,把国家维护海外利益过程中形成实际控制的利益节点区域,纳入国家疆域的范围来论述,进而确定其利益边疆的属性。三是根据国家决策层把国家疆域不同类型的边缘性区域问题的应对置于国家治理的总体框架中所作的部署,把不同类型的边疆形态的治理结合为一个整体,从一个完整体系的角度来看待和论述边疆治理,突出了边疆治理的整体性。

经过这样一番基于“边疆治理”概念与国家的边疆治理过程的互动而进行的调整,“边疆治理”概念的内涵得到进一步丰富:一是形成了从国家政治地理空间角度来认知国家的疆域观念,突出了其国家权力覆盖的特征和整体性;二是突破了仅仅从主权角度来界定疆域的观念,充分注意并体现了疆域的复杂性和边疆的多样性;三是突出了边疆问题的多样性、复杂性及其对国家发展的挑战,突出了中央政府和

地方政府应对边疆问题的多重责任;四是深化了以国家力量应对边疆问题的复杂性和动态性,突出了在应对边疆问题过程中建立相应体制的问题,深化并丰富了边疆治理的内涵。

经过“理论—实践—理论”的过程,“边疆治理”概念的运用更加广泛,影响也在不断扩大,并得到了学界充分的肯定。王浦劬认为,这一“原创性”概念的提出,“使得不同历史阶段和各种形态的边疆治理,本质性地统一归于国家治理”,有利于深化对国家治理的认知。^④

本土性概念构建的意义及启示

“边疆治理”概念创建之后,首先在学术界得到广泛地使用,并促成了边疆治理研究领域的形成;随后又被国家最高决策层采纳,成为重要的政策工具。“边疆治理”这个本土性概念的建构是成功的,并具有典型性。

从“边疆治理”概念创制的缘起和过程来看,本土性概念的创建并不是学者或知识生产者主观愿望的产物。虽然学者或知识生产者是本土性概念创建的关键性角色,但这样的概念创建缘起于现实的需要。在现实问题凸显并被意识到之后,学者或知识生产者以自己的责任担当和专业能力来回应现实的需要,通过深入的学术研究和学术创造,才会实现本土性概念的建构。现实的需要是本土性概念创建的根源。

中国走自己的道路并快速发展,尤其是在以改革开放推动的现代化持续推进的过程中,由西方传入的知识和叙事,由于缺乏中国的经验基础且渗透着基于西方历史和文化而形成的价值取向,不能有效解释中国现象的问题逐渐凸显。中国历史上基于传统的农业生产方式而形成的知识和叙事,也无法有效解释今天的现实。这样一个在快速发展中遇到的有效知识供给不足的困扰的焦点在于,发展中的现实问题产生之后缺乏恰当的概念进行描述和分析,因而无法形成有效知识和叙事。在这样的挑战面前,以本土性概念创建来回应现实的需要就显得必要而紧迫,由此进行的概念创建才能获得成功。

从“边疆治理”概念来看，一个为满足现实需要而成功创建的本土性概念，具有重要而突出的意义。

一是提供认识工具。概念是认识的成果，但概念形成之后又会成为我们“进行思考、批评、辩论、解释和分析的工具”，从而促进对事物的认知。为回应现实需要而创建的本土性概念的最大意义，就是对一类事物的认识提供了有效的工具。“边疆治理”概念创建以后，国家应对边疆问题这一愈加突出的治理过程便有了一个恰当的认识工具，为有效描述和分析这一治理过程提供了便利，因而不仅被广泛地述说，而且还促进了相关的研究。

二是促进知识生产。中国在持续而快速的发展过程中，有效知识供给不足是一个根本性问题，并使自主性知识生产成为一个重大的时代命题。在这样的背景下，本土性概念创建所提供的认知工具的功能得到发挥，就能促进自主知识的生产。“边疆治理”概念成为一个描述和分析国家应对边疆问题过程的认知工具之后，促成了边疆治理研究井喷式增长，以及边疆治理的研究机构雨后春笋般出现，从而促成了相关知识生产能力的增强。

三是服务国家决策。“边疆治理”概念创建后，首先在学术研究中被采用，随后被国家决策采纳，这一概念因此获得了政策概念/工具的意义，从而将社会领域概念的社会功能直接而明确地体现出来。这也表明一个问题，发挥必要的社会功能，是社会领域概念创建的重要价值追求。

四是传承中华文明。中华文明的相当一部分表现在精神文化层面，并与农业生产方式紧密相关。精神文化方面的中华文明的传承，有赖于既反映现实又与传统文化直接关联的本土性概念的桥接。“边疆治理”的创建，不仅能以此来描述和分析历史上国家政权应对边疆问题的方略和方式，而且能借此对历史上的观念和有效的做法进行改造，使之能够在今天的边疆治理中发挥作用，从而使传统的边疆文化得到有效的延续。

本土性概念的建构并不是任意地创造概念。本土性概念的创建要取得成效，面临着一系列实际问题。“边疆治理”概念的成功创建，也为本土性概念建构提供了一些启示。

首先要面向中国现实。中国今天的本土性概念建构问题，根源在于中国特色道路发展中的现实需要，只有面向中国现实的概念建构，才能在回应现实需要的过程中彰显自身的价值。

其次要坚持自主创造。本土性概念的建构必须在面向现实的基础上进行自主创新，提出符合规范的且能满足现实需要的新概念。照搬西方的概念或者将外部的概念进行迁移，以及固守传统或将历史上的概念进行新的解释而推陈出新，都无法达此目标。

再次要形成完整体系。一个有效的本土性概念的形成，需要一系列相关知识的支撑，这些知识涉及许多相关问题，相互间具有内在的逻辑关联，从而形成一个认知结构。概念本身只是其露出水面的冰山一角。本土性概念的建构，必须使相关的知识成为一个体系，这样才能使建构起来的概念具有丰富的内涵，从而具有解释力。

最后要注重实际效果。本土性概念建构并非只为提出概念，而是为了对现实问题进行有效的描述和分析。能够满足现实需要的概念才有意义和生命力。本土性概念建构必须把实际效用作为基本追求。概念建构取得或具有实际效果的最直接表现，就是建构起来的概念有人采用从而获得普遍性，因此，可以将概念传播的范围和使用频度作为概念建构评价的指标。

注释：

- ① 马大正：《当代中国边疆研究（1949—2014）》，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484页。
- ②③ 安德鲁·海伍德：《政治学核心概念》，吴勇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2页，第2页。
- ④ 王浦劬：《以边疆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家治理现代化——〈中国的边疆及边疆治理〉读后》，《政治学研究》2022年第2期。

作为自主的知识体系，在内容结构方面，至少要包括概念体系、方法体系、问题体系和案例体系等，其中，概念可以说是知识的基石，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是否建成，主要取决于是否形成了一系列自主的



标识性概念。

那么，何谓成功的概念建构？或者说，一个概念被提炼出来后，它要经过怎样的价值规范、学科实践和历史演进的检验或校准，才能成为标识学科属性、定义研究边界、引领知识生产的可操作的工具？为了回答这个问题，本文试着从政治学的既有知识出发，基于经验的维度，总结出如下四条作为成功的概念建构的基本标准。

具有突破性的理论解释力

一个被成功建构出来的学术概念，首先必须是一个能够穿透表层现象揭示深层机制的语词。这可以说是概念的共性。此外，概念建构有一个不言而喻的前提，即它特指在既有概念范围之外，新建一个不同于原有表达的概念，这就意味着，成功的概念建构还必须突破传统认知或者既有知识的边界，提供某种新的解释维度。

在政治学或者相关学科的发展历史上，

何谓成功的概念建构

叶娟丽，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教授

类似概念建构的成功案例并不少。如马克思的“剩余价值”，作为批判分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核心概念，其建构过程就凸显了对传统认知的突破。早在1847年12月《工资》手稿以及1849年4月正式发表的《新莱茵报》社论《雇佣劳动与资本》中，马克思为了论述商品的交换价值的总和是怎样成为资本的，提出了一种新的理念，即工人会“生产重新供人利用去支配他的劳动并借他的劳动创造新价值的价值”。^①在1858—1859年写成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首次正式将上述价值称为“剩余价值”。^②1865年马克思的英文论文《工资、价格和利润》开始扼要而通俗地说明“剩余价值”的形成过程和工资的实质，^③到1867年的《资本论》第一卷，开始系统地论述“剩余价值”这一概念的内涵与本质，并形成关于资本主义剥削的经典理论。其实，在英国古典经济学家如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的研究中，不乏“价值”“劳动价值”等经典的概念，但这些概念都不足以说明资本增殖的秘密，唯有用以指代被无偿占有的剩余劳动的“剩余价值”这一概念，才能揭示劳动力成为商品的具体机制，对资本主义的扩大生产与等价交换等既有现象提供新的解释维度。

同样，哈特（Michael Hart）和奈格里（Antonio Negri）的“帝国”（empire）概念，也形成了对原有知识的突破性解释。在原有认知中，“帝国”指的是具体的政治实体，如古罗马帝国、大英帝国等，它们通过军事、政治、经济等手段对其他国家或地区进行直接控制和支配，这种国家扩张的方式即帝国主义。经典的马克思主义“帝国主义”的概念基础，是由罗莎·卢森堡和列宁奠定的。1911年12月19日在柏林第一国会选区的演说中，卢森堡就痛斥了帝国主义在政治、贸易政策和经济政策方面所带来的后果，^④后来更是强调帝国主义侵略本性可能带来的对人类文明的毁灭。根据卢森堡的定义，“帝国主义政策不是这个

或那个国家的产物，它是资本的世界性发展成熟到一定程度的产物，它从来就是一种国际现象。它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只有通过它的各种相互关系才能认识这一整体，而且任何一个国家都是不能摆脱这一整体的”。^⑤在1916年《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中，列宁也谈到了帝国主义的战争本性，并揭示了帝国主义矛盾的深刻性和帝国主义产生革命危机的必然性，认为资本主义的最高历史阶段即帝国主义所特有的就是“资本主义的寄生性和腐朽”。^⑥与此相对应的是，哈特和奈格里突破传统“帝国”概念中单一主权国家、军事暴力控制、作为资本主义发展最高阶段等特征，创造了一个新的全球化时代经由跨国资本而形成的“帝国”概念，它“支撑起生产全球化之网，试图把所有权力关系都置于它的世界秩序之下”。^⑦这个新的“帝国”，消弭了“民族国家色彩”，^⑧它尽管仍然是统治机器，却是“一种新的经济—工业—通讯交往机器”，^⑨它不再是通过暴力、战争、军事占领和殖民地控制而实现的全球霸权和经济剥削，而是通过民族国家、跨国公司、国际机构、非政府组织等，基于全球资本流动、信息流通和文化霸权而形成的多中心、去国家化、无疆界的网状全球权力结构。相较于同时代的“全球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这些概念，哈特和奈格里的“帝国”概念因为继承了经典帝国概念中“全球殖民”这一内核，对当代不平等的世界政治经济秩序，更具有解释力。

具有可操作的研究适用性

成功的概念建构应服务于研究实践，其形成的概念框架应具备方法论指导价值，具有可操作性。这是因为，概念都是高度抽象的结果，无法直接用来进行实证分析，要充分体现概念建构的理论意义，还需要将抽象的概念操作化，这包括在具体的研究中确定概念的边界，即明确概念的内涵与外延，如上述的“帝国”概念，其内核当然是“全球殖民”，而外延就是限定在国际范围而并不涉及一国之内的政治、经济权力关系。此外，像“帝国”这类概念，还需要转化为具体的、可分析的维度，如全球性统治、非传统的政治

控制、多元化的统治方式等，都是理解全球化时代“帝国”现象的一些可观察的最基本指标。另有一些概念，还必须可以分解成一些可测量的变量，确保研究的可重复性和可验证性。如前述“剩余价值”，它还可以操作化为劳动力的价值、工作日总劳动时间、必要劳动时间和剩余劳动时间等具体的变量，然后通过某种公式的计算，将“剩余价值”这个抽象的概念变成可收集、可分析、可计量也可重复验证的研究工具，进而将抽象的思维转化为具体的科学应用。

在政治学领域的概念建构中，不乏极具操作性的成功案例。如韦伯的“层级官僚制”(bureaucracy)即我们中文语境下的“科层制”概念，不仅具有定性描述的特征，还包含了一些具有可操作性的可测量的指标。在定性方面，韦伯继承了古法语中“科层制”的原意，即法语 bureau (办公桌或办公室)+ 希腊语 κράτος (统治或权力)，再加上英语中引申出来的“办公室暴政”(the Bureaucratie or office tyranny)，将科层组织定位为“一台机器”，它的特征是“精确、迅速、明晰、档案知识、连续性、酌处权、统一性、严格的隶属关系、减少摩擦、降低物力人力成本，在严谨的——尤其是独断形式的——官僚制行政中都可以达到最佳状态”。^⑩而职业官员“不过是一部无休止运转的机器上的一个小齿轮，这部机器为他规定了一条实质上是固定的行进路线”。^⑪这样的“科层制”具有九个方面的特征，包括严格分工、等级制、正式的权力指挥链、官员基于专业技能的正式选拔、官员职业化、职务常任、组织稳定性、规则化而非个人评估、非人格化决策。^⑫这些特点结合威尔逊(Woodrow Wilson)、米塞斯(Ludwig von Mises)、默顿(Robert K. Merton)、杰奎斯(Elliott Jaques)等人的研究或者进一步解读与应用，使“科层制”



发展出一些具体的可以观察与测量的变量，如职能方面的专业化程度、部门协作效率，等级体系方面的层级深度、权力链条透明度，规则化程度方面的成文规章覆盖率、规则执行一致性，非人格化水平方面的情感干预指数、标准化服务率，专业选拔机制方面的技术资格门槛、晋升考核客观性，档案管理强度方面的行政文书完备率、信息检索效率等。这些具体指标与变量的提出，使得“科层制”这一概念在现代政治制度与国家治理研究中得到了广泛的使用。

同样，在政治学领域，林茨（Juan J. Linz）的“双重合法性”（dual legitimacy）概念，^⑬也具有上述特点。根据林茨及其合作者的解释，双重合法性又称双重民主合法性，特指总统制下因为民选的立法机构与总统都声称自己是人民的合法代表、都享有民主合法性而可能导致的权力冲突与政治僵局。这一概念的提出对揭示总统制面临的宪法困境与治理难题具有重要的解释意义。但它的意义并不止于此，在后续的概念应用中，“双重合法性”被分解为如下可以观测与验证的指标：权力对峙强度方面的行政—立法僵局频率、总统单边行动倾向，合法性竞争烈度方面的民意支持率分裂程度、政党极化指数，宪法危机表征方面的向宪法法院提起诉讼的案例数量、弹劾总统的次数等。^⑭借助于这些具体的分析工具，“双重合法性”概念被广泛应用于分析总统制政体中的政治不稳定、政府合法性危机、权力斗争和民主制度的运作等，为理解总统制国家的政治动荡或者政治危机提供了重要视角。

具有持续的影响力

成功的概念建构，不仅要在短期内具有理论意义，还需要在长时间内保持其有效性和应用价值。也就是说，一个有效的

概念不仅能够当下引发关注、解决具体问题，还应具有跨时间的延续性，能够持续影响相关学科的发展，或者在不同的历史、社会情境中保持其适用性。它就如同认知基因，其中既包含稳定的核心编码（基本原理），又具备变异适应性（解释弹性），能在知识进化中持续产生新的概念组合，进而形成其特有的生命力。

由于人类尤其是人性的变迁是异常缓慢的，而人类的行为模式（主要是社会行为和心理反应）深受人性本能、文化习俗、社会结构和历史经验等因素的影响，因此，人类的生物学基础、进化背景以及长期形成的社会行为模式并不会因为一时的社会变动或文化潮流而快速发生根本性改变。基于此，那些揭示人类行为和心理深层结构普遍规律的概念与理论，往往具有跨时间的适用性，能够在不同历史时期应用于解释人们的行为模式，比如吉登斯的“结构二重性”（duality of structure）以及勒庞的“群体心理非理性”（irrational group psychology）概念。

在早期关于结构理论的研究中，吉登斯提出了著名的“结构二重性”概念。^⑮他认为，在社会生活中，社会结构与社会行动是动态互构的关系，而非单向的因果决定；结构外在地约束行动，行动者及其行动又能动地改变着结构。这一概念既不同于涂尔干等结构主义者将个体行动仅仅看作是结构的被动反映，也迥异于存在主义者无视结构的作用而将个体行动视作社会变革的根源，既强调结构及其中的规则、资源对行动的影响，也承认结构是个体行动不断再生产的结果。基于此，这个概念突破了对结构与行动者关系的简单二分，对个体能动与结构约束进行了相对折中的解释。自提出以来，“结构二重性”概念始终是关于社会变迁、社会稳定、社会运动等领域研究首选的分析工具。

勒庞的“群体心理非理性”概念也具有同样的特点。在1895年出版的法文著作 *Psychologie des Foules* 中，勒庞提出，临时聚集起来的人们，因融入群体而获得了“集体心理，这使得他们的感情、思想和行为变得与他们独自一人时的感情、思想和行为颇为不同”，^⑯会丧失理性，表现出冲动、情绪极端化、易受暗示、“极易受到操纵，莫名其妙地情愿受骗上当”^⑰

等特征。这种“集体无意识”状态，在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存在，在今天的互联网时代也随处可见。即使不再有勒庞时代“乌合之众”形成的特定时空，但人类在群体行为中内在的那些情感化、低智化、易受权威象征支配等倾向，仍然完美契合今天社交媒体中跨地域聚合的群体的心理动机与行为特征。正因如此，“群体心理非理性”这一概念跨越百年时空，在解释群体性事件、网络民粹主义、后真相等议题时仍然极具理论解释力。

具有广泛的跨界接受度

所有的新概念都出现在具体议题的研究中，而从具体的研究中形成的新概念到真正成功的概念建构，还需要适度的“知识搬迁”，即从概念的原生领域到一个新的领域，甚至从一个专业到另一个专业，一个学科到另外一个学科。这既是人类认知体系本质上对“可迁移知识模块”的渴求，也是科学实践在多重维度上实现知识贯通的必然结果。基于此，我们可以说，成功的概念建构需要突破专业壁垒，显示出广泛的跨界接受度。

今天政治学研究中广泛使用的很多概念，就来自其他领域和学科的研究贡献，如“韧性”（resilience）和“社会资本”（social capital）。

“韧性”的词根为拉丁语 *salire*，一个意思为“跳跃”的动词；其现在分词 *resilire*，成为英语 *resilience* 的来源，意思是“回跳”或者“后退”。“韧性”最早被用于物理学中，指物体经压缩变形后恢复其尺寸和形状的能力。后引申到生态学与心理学中。在生态学中，“韧性”特指生态系统从扰动中恢复的能力，包括气候适应能力与土壤恢复能力等；在心理学中，“韧性”指通过心理、情感和行为的灵活性以及对外部和内部需求的调整，从不幸或变故中恢复或轻松适应的能力。今天，科学家沃克（Brian Walker）倡导的“韧性思维”^⑧被广泛应用于政治学研究中，如组织韧性、社区韧性、城市韧性等，用来指代复杂的组织（社区以及城市）系统承受环境压力和变故后能够超越逆境、管理其中的混乱、通过自我修复而正常运行的能力。

福尔克（Carl Folke）等将上述生态系统或者制度体系为回应压力和限制条件而激发起来的这种变化、适应和改变的能力，概括为持续性、适应性和转变性，^⑨不仅适用于自然系统，也适用于对政治系统的研究。

“社会资本”在传统上被广泛理解为与个人资本相对应的一个纯粹经济学概念，后被引入社会学研究中。现代意义上的“社会资本”概念大概从19世纪90年代开始被断断续续地使用，如托克维尔研究的美国公民的社区参与程度，杜威则在其专著《学校与社会》（*School and Society*）中直接使用了“社会资本”这个概念。^⑩一般认为，社会学中的“社会资本”概念的创始归于美国实干的改革家汉尼方（L. J. Hanifan）。^⑪汉尼方正式提出了“社会资本”的概念，且将其界定为某种善意、伙伴关系、相互同情与社会交往，这已经接近了帕特南的“社会资本”定义。社会学家布迪厄（Pierre Bourdieu）和科尔曼（James Coleman）为“社会资本”的研究作出了杰出贡献，而帕特南三本著作的出版则将“社会资本”在政治学研究中的应用推向鼎盛，尤其是《使民主运转起来》成为“社会资本”介入政治学研究的里程碑。此后，“社会资本”这个发源于经济学、经由社会学而走向政治学的概念，由于对社会信任、政治参与、社会整合和资源分配等政治现象的重视，而成为政治学研究中深入探讨民主治理、政治稳定和政治发展等议题的重要工具。

结语

总之，从科学实践来看，一个概念的建构是否成功，创新性、适应性、可推广性等是其中重要的判断标准。任何一个新概念的提出，都是突破传统解释限度的结果；但一个好的概念，仅有解释深度是不



够的，还需要有解释的广度，需要有可塑性与演化性，从一种语境到另一种语境，从一个领域推广到另外一个领域。而这种概念解释力的时空跨越或者可推广性，来源于概念的“可操作性”，即新概念内含的从抽象的语词转化为具体的研究框架或者工具的属性。现实中我们碰到的概念创新难题，往往不是不能创造出新的术语或者语词，而是无法确保概念具有跨越时空的历时影响力。

基于中国经验，近些年我们拥有了很多新的解释概念，如“差序政府信任”“政治锦标赛”“贤能政治”“全能主义”等，在某种程度上，这些概念都具有突破性的理论创新，对中国经验提出了新的解释视角。但从应用的广泛性上看，它们之间还是存在一些差别。如“差序政府信任”“政治锦标赛”这两个概念由于自带一些可行的分析维度和变量，可以量化或者模拟和模型化，而频繁地出现在政治学、社会学专业的中国研究成果中；而“贤能政治”“全能主义”这两个概念相对更加抽象，且其内涵与外延还存在一些理论争议，如“贤能政治”容易窄化为领导人选拔、“全能主义”容易陷入集权与极权之争，因而并没有成为政治学中广泛使用的分析工具。在这里，概念的可操作性就显得尤为重要。当前，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任重而道远，建构以“人”为中心的人民民主系列概念和以“事”为起点的国家治理系列概念，是当前学界共同努力的方向。在这一学术长征中，创新性、适用性是我们应当坚持的前提，与此同时，可操作性、可推广性，也应成为我们创新概念的基本准则。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21年，第488—490、640—64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4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6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46—154页。

④⑤《卢森堡文选》下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314—316页，第386—457页。

⑥《列宁选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78—581页。

⑦⑧⑨ 迈克尔·哈特、安东尼奥·奈格里：《帝国》，杨建国、范一亭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0页，第3页，第46页。

⑩⑪ 马克斯·韦伯：《经济与社会》第2卷上册，阎克文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1342页，第1360页。

⑫ Max Weber, "The Nature, Conditions, and Development of Bureaucratic Herrschaft," in Tony Waters and Dagmar Waters eds., *Weber's Rationalism and Modern Society: New Translations on Politics, Bureaucracy, and Social Stratification*, Basingstoke: Palgrave Macmillan, 2015, p. 76.

⑬ Juan J. Linz,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Journal of Democracy*, vol.1, no.1, 1990, pp. 51-69; Juan J. Linz and Arturo Valenzuela eds., *The Failure of Presidential Democracy*, Baltimor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94.

⑭ Leiv Marsteintredet and Einar Berntzen, "Reducing the Perils of Presidentialism in Latin America through Presidential Interruptions," *Comparative Politics*, vol.41, no.1, 2008, pp. 83-101; William A. Clark, "Presidential Power and Democratic Stability under the Russian Constitution: A Comparative Analysis," *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vol.28, no.3, 1998, pp. 620-637; Yüksel Alper Ecevit and Ekrem Karakoç, "The Perils of Semi-Presidentialism,"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38, no.1, 2017, pp. 4-20.

⑮ Anthony Giddens, *Central Problems in Social Theory*, London: Macmillan Press, 1979; *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Outline of the Theory of Structuration*, Cambridge: Polity Press, 1984.

⑯⑰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4年，第18页，第221页。

⑱ Brian Walker and David Salt, *Resilience Thinking: Sustaining Ecosystems and People in a Changing World*, Washington, D.C.: Island Press, 2006.

⑲ Carl Folke, et al., "Resilience Thinking: Integrating Resilience, Adaptability and Transformability," *Ecology and Society*, vol.15, no.4, 2010, DOI: <https://doi.org/10.5751/es-03610-150420>.

⑳ John Dewey, *The School and Society*,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899.

㉑ 罗伯特·帕特南：《独自打保龄：美国社区的衰落与复兴》，刘波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7页。